

因果的层级与缝隙：陈赞一《小丑》小说集的结构主义解读

刘坤

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(研究生)

引言

谢志强评析陈赞一微型小说时，总结出“对话”，“重复”，“潜隐”，“系列”，“思考”，“写实”六个关键词，准确把握了陈赞一创作的技法特点，而且表明“微型小说是提出问题的艺术，只问不答”¹，袁龙重视香港微型小说“纸短意长”的审美传统²，这些本土批评给认识陈赞一的作品带来很多角度，把前面的观点同罗兰·巴特的结构主义理论联系起来，就可以更深层次地探究《小丑》小说集中包含的十三个故事，它们内部的“因果联系”体现在哪里？作者安排的人物命运的起落，是由偶然的个人事件造成，还是某种深层逻辑必然促使如此？以及陈赞一在写作中是如何精心设计叙事形式，呈现小人物在现代社会中“因何如此”的命运轨迹，以及如何在必然性中为自由留下可能。

一、表层因果：叙事功能与序列中的命运展开

罗兰·巴特于1966年提出，在《叙事结构分析导论》中，叙事由“功能”单位形成，功能的基本单元是“信息单元”，功能的合成形式影响着叙事的意义。他把功能划分成两类：“分布功能”与“整合功能”³，“分布功能”关乎行动的横向推动，“整合功能”关乎意义的纵向挖掘，在此框架当中，陈赞一小说里的对话和重复就是这两种基本功能类型。

（一）对话作为分布功能：问答之间的命运转折

巴特表明，分布功能是叙事的支架，这些功能依照因果逻辑串连成序列，促使情节得以发展，《小丑》里的对话便是此类分布功能单元，周愉持续向世界提问他的小丑表演可以给人们带来笑容吗？世界则用沉默或者嘲讽来回应他，巴特所言的“核心功能”就是那些左右故事走向的重要节点，比如与太太有关于表演会的交谈，于是满怀期待地准备演出；又如与同事谈及此事，遭遇多年同事只有一人愿意购票的尴尬境地；再有与学生交流，才知晓当小丑很难赚大钱的冰冷现实，每组对话都是巴特所称的“核心功能”⁴，它们包含着“预期—落空—再次预期—再度落空”的因果循环。巴特重视，核心功能间的逻辑联系不可倒转，后一功能需以先前功能为前提，《小丑》中的对话序列就如此，

¹ 谢志强. 六个关键词：陈赞一微型小说面面观[J].

² 袁龙. 香港微型小说的抒情叙事与市民心态[J].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 2016(6).

³ 罗兰·巴特著. 符号学历险[M]. 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 第113页。

⁴ 罗兰·巴特著. 符号学历险[M]. 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 第116页。

每次对话均依循前次对话的结果，一同促使周愉迈向悲剧终点。《礼物》把对话的分布功能发挥到了极致，小说跨越了七年时光，核心情节却是两次相同的提问：“你想怎样？”第一次出现在大学时期，徐丽芳在火车站鼓起勇气问陈子善，陈子善反问：“什么‘想怎样？’”⁵——他没领悟到问题的分量。第二次则是毕业多年以后，徐丽芳又问出了同样的话语，陈子善仍然没有察觉，直到收到退回的项链和信件之后，他才意识到：“这七年间，我一直戴着这条项链，就是想要听到你回答，你打算怎么办。”⁶不同位置产生的相同功能会有不一样的意义，两次提问表面上一样，但第一次属于开创可能性的“初始功能”，而第二次则是结束可能性的“终局功能”——其间相隔七年的时延，使得同样的提问具备了完全不同的话语分量。

在《归家》当中，冯羨德命运的转折点在于一场关键对话，他离开家三十多年之后，在旧金山的教堂里听到牧师宣讲：“没有谁会对你定罪吧？”“我也不会对你定罪，你可以走了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错误了。”⁷这句话成了促使他回家的关键因素，不过小说里真正重要的对话却是“缺席”的——冯羨德一直没能跟母亲，弟弟展开对话，也无法当面诉说自己的悔意，巴特在谈论功能的时候提到，“缺席”也具备一种功能，这表明某种可能已经结束，等到冯羨德回到香港之后，发觉母亲已经去世，房子也被拆掉，那些尚未达成的对话便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
（二）重复作为整合功能：循环中的命运必然

对话可说是巴特所言的“分布功能”，重复则是“整合功能”，巴特表明，整合功能不会促使情节发展，其关注的是人物的性格，情感以及氛围等纵向层面，热奈特于《叙事话语》一书中把“频率”概念加以系统梳理，并且区分为“单一叙事”“重复叙事”“叠加叙事”，陈赞一的小说里频繁采用重复手法，这便是“叠加叙事”的典型应用，即经由重复来表现人物命运注定如此。

《一生》全文不到五百字，用极为简略的更新叙事表现出生命本质，“鬧鐘響，起床，離開房子，進入房子，關燈，睡覺。鬧鐘響，起床，離開房子，進入房子，關燈……”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直到“最後，鬧鐘不再響，他也不再離開房子，進入房子”⁸。巴特所说的“整合功能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——这些重复并非推动情节发展，而是营造出一种“生存状态”，使得读者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异化特征，袁龙表明这篇小说“显示出每日每月每年的重

⁵ 陈赞一《小丑》，香港：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3 年版，第 44 页。

⁶ 同上，第 46 页。

⁷ 同上，第 127 页。

⁸ 同上，第 76-77 页。

复乃是人生得以延续的基础，唯有死亡之时才无需重复”⁹。人生本就是重复的过程，所以死亡才是彻底的“不再重复”，文中分散的死亡事件指的是最后一声闹钟不再响起，而整合的重复状态则指一生中的日常循环，二者彼此呼应，一起形成了叙述的完整意义。巴特在论述整合功能时强调，相同的功能可以指向不同的“标志”——《一生》的重复指向“异化”，它不是直线推进，而是纵向深化，这正是其特性。

二、深层因果：零度写作中的人物命运根基

对话与重复是命运表层的因果联系，潜隐部分则关乎命运深层的因果，即那些未曾言及的往昔，未出现的其他人以及未展露的社会背景，这些都是人物命运的实质根基。罗兰·巴特在《写作的零度》（1953）里提出的“零度写作”概念，给认识这个层面给予了重要工具，“零度写作”是一种“一种直陈式、新闻式的写作，是一种毫不动心的、中性的白色写作。”¹⁰，作家要隐去个人情感的干预，让事实自身发声，陈赞一的叙事风格和巴特的零度写作存在本质上的亲近之处——他很少直接评论人物命运，而是经由细节的提示，对比的显现，名字的寓意，让读者体会到文本之下的庞大冰山根基。

《何月满》全文不足千字，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生故事。中秋之夜，一位孤独老人到破旧烧腊店饮酒，与同样孤独的伙计攀谈。老人自述二十岁当兵，“打完日本鬼子又打共产党”，被俘后逃到香港，“当苦力”“好饮两杯”“连老婆也讨不到一个”。直到小说结尾，伙计才说：“小姓何，叫何月满。”——原来这位伙计的名字就叫“月满”¹¹，生日正是八月十五。巴特的零度写作在此体现：作家不置一词评判，只让事实呈现。名字（“月满”）与命运（孤独）之间的巨大反差，正是小说潜隐的力量所在。王海峰从镜像隐喻的角度解读这篇小说，认为“何月满”这个名字“恍若变成了一种殷切的询问：‘何’时真正‘月满’，何时个人与家国真正团圆？”战争、逃难、苦力生活、酒精依赖……这些被一笔带过的经历，才是人物今日处境的真正原因。巴特所言的“零度”不是没有温度，而是温度来自事实本身，而非作者的评论。

《拐》中，赵于飞每天在太太相片前上香：“我要带志强去上厕所，很快就回来看你。”¹²太太已经去世，却始终“在场”——她决定了赵于飞的生活节奏，也决定了他对小狗志强的称呼（志强是他本打算给儿子取的名字）。小说中有一处极为关键的“潜隐”：赵于飞为何与太太没有子女？为何将小狗视为儿子？

⁹ 袁龙. 香港微型小说的抒情叙事与市民心态[J].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 2016(6).

¹⁰ 罗兰·巴特著. 符号学原理[M]. 李幼蒸译. 三联书店出版社, 1989年. 第75页。

¹¹ 陈赞一《小丑》，香港：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版，第51—53页。

¹² 同上，第68页。

这些从未被言说，却构成了人物命运的深层原因。读者只能从“打東洋鬼子時弄跛的”¹³腿，推测他经历过的战争与苦难；只能从他与志强的相依为命，推测他一生未曾获得的亲情。巴特在论述零度写作时强调，作家的沉默是一种策略性的“退场”，目的是让读者进入文本。当老人院工作人员拒绝志强入院时，赵于飞“蹲下来摸摸志强，志强親暱地吠了兩聲，脫了很多毛的尾巴，緩緩地搖著、搖著……”¹⁴这沉默的一幕，胜过千言万语。巴特所说的“零度”正是这种让事实说话的姿态。

《剪髮》中，“我”偶然回到旧居，遇到小时候为自己剪发的高叔叔。小说细致描写了高叔叔的衰老：剪刀钝了，手开始颤抖，“有時頭髮夾在剪刀中還未斷他就繼續剪，弄得我的頭皮很痛”¹⁵。但更深层的“潜隐”是：高叔叔为何会沦落至此？答案隐藏在几个细节中：“最近生意不好，于是又回到這裡来”“再没有十个八个小朋友坐在地上一邊看連環圖，一邊排队轮候”¹⁶。因为城市重建，老街坊搬走了；因为时代变迁，小孩子不再喜欢看“破舊的老夫子”。作者不解释这些细节的意义，而是让细节本身说话。高叔叔的困境，是城市空间重组与代际文化断裂的共同结果，而这些原因都隐藏在沉默之中。

阿尔都塞提出“结构因果律”概念，该概念表明，原因并非要素自身，而是要素间的结构联系¹⁷，此观点同巴特的“功能合成”思想相互应和，巴特也关注到，叙事意义并不在于单个功能，关键在于功能之间的合成形式，¹⁸《小丑》小说集包含十三篇作品，它们形成一个“互文网络”，人物命运彼此呼应，对比，互补，一起表现出现代小人物的生活状况，这便是结构因果律在文学上的体现。

老人的三重命运形成一组深刻的对比，《拐》里的赵于飞被制度隔绝，只能无奈地同朝夕相伴的小狗分离，《何月满》中的何月满遭受亲情疏离，中秋佳节独自一人在简陋的小店里饮酒，《剪髮》里的高叔叔被时代遗弃，他的手艺再也没人来问，最后悄然隐没在余晖之中。这三位老人存在相同的“因”，即年老体衰，社会变革以及家庭支撑缺少；但是其“果”却各有差别，赵于飞只能被迫分离，何月满只能独自饮酒，而高叔叔则只能默默退出舞台，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表明，这些命运并非是个别随机事件，而是社会结构对于个体所发出的一种“召唤”。在一个极速发展的都市当中，老人属于被牺牲的群体，这种情况是由结构决定的，并非个别人类偶然造成的，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

¹³ 同上，第 68 页。

¹⁴ 同上，第 74 页。

¹⁵ 同上，第 136 页。

¹⁶ 同上，第 134-135 页。

¹⁷ 阿尔都塞. 保卫马克思[M]. 顾良, 译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6 年.

¹⁸ 罗兰·巴特著. 符号学历险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 第 138 页。

显示，这些命运不是孤立的个体遭遇，而是社会结构对个体产生的“召唤”，在这样的都市环境里，老人往往会失去应有的地位，这是结构本身具有的必然性，而不是某个个体碰巧发生的意外。

理想主义者会有三种结局，这些结局表现出理想与现实关系的不同模式，《小丑》里的周愉守住单纯的“小丑理想”，最后孤身离世；《好结局》中的廖青云得到妻子支持去写童话，但一直无法解决生活难题；《酸枝》里的华宏业把传统工艺同现代设计融合，从而闯进国际市场。把这三篇小说做对比，就能看出理想与现实关系存在三种模式：要么纯粹斗争，要么艰难维持，要么革新式转变，陈赞一就是经由一系列排列，让读者在比较当中思索：怎样才好让理想主义在现代社会立足？

爱的三种形态构成现代人情感生活的谱系。《礼物》中是“错过的爱”——因未能及时表达而永远失去；《浪》中是“被交换的爱”——何家安一生都在用付出换取虚假的温情；《少年情》中是“未完成的爱”——张翠薇默默付出，何志文后知后觉，最终天各一方。三篇合观，呈现出现代人情感生活的共同困境：爱的表达总是迟缓，爱的付出总是不对等，爱的理解总是滞后。巴特所说的“功能的组合意义”在此显现——单篇文本的意义在系列网络中得以深化和延展。

三、超越因果：作者之死与读者生产中的命运自由

巴特在《作者之死》（1968）¹⁹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：文本的意义不由作者垄断，而由读者在阅读中生产。宣告了作者的退场，将意义生产的权力交还给读者。热奈特在《新叙事话语》中进一步提出了“叙事交流”的完整模型，包括“真实作者—隐含作者—叙述者—受述者—隐含读者—真实读者”²⁰六个层级。在这个模型中，“思考”既是人物的行动，也是隐含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方式——通过人物的思考，作者向读者传递对命运的反思。

《遗失之神》是一篇关于思考本身的小说。垃圾站旁废弃的雕像被误认为菩萨，信徒们争相膜拜；雕像失踪后，众人又自动赋予其“功德圆满，飛升到玉皇大帝那處”的新意义。唯有那个孩子问出关键问题：“菩萨什么都可以寻回，为什么它寻不到自己？”²¹这个问题是对整个信仰体系的根本性质疑。巴特的作者之死在此显现：作者不给出答案，而是将问题留给读者。通过孩子的思考，小说揭示了意义生成的偶然性与任意性——人们需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能够安放焦虑的符号。因为人类无法承受意义的虚空，所以会自发地创造符号、

¹⁹ 罗兰·巴特著. 罗兰·巴特随笔选[M]. 怀宇, 译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 第 300 页。

²⁰ 热奈特.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[M]. 王文融, 译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0 年。

²¹ 陈赞一《小丑》，香港：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3 年版，第 118 页。

赋予意义。思考者的任务，就是不断追问这些符号的合法性。孩子的提问，正是对因果链条的突破——他不接受既定的解释，而要探寻背后的真相。巴特所说的“读者的诞生”正是以“作者的死亡”为代价²²——当作者退场，读者成为意义的共同生产者。

《好结局》是一篇关于写作的写作，即“元小说”。廖青云坚持创作儿童文学，因为他认为写儿童文学一定要有好的结局，那样小朋友才会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好结局。他在现实中的遭遇却一次次证明，“好结局”在成人世界并不存在。小说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：在一个没有好结局的世界里，是否还要坚持写“好结局”？廖青云的答案是肯定的——不是因为世界真的有好结局，而是因为“好结局”作为能指，具有抵抗虚无的伦理功能。正如妻子所说：“如果再没有童话，下一代将不再相信有理想。”²³这里的因果关系是：因为现实残酷，所以更需要童话；因为成人世界不相信理想，所以更要为孩子守护理想。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在此获得反讽性应用——廖青云作为“作者”选择退场，让“好结局”成为读者（下一代）可以相信的可能性。他的思考与选择，正是对现实因果的超越。

《归家》的结尾，冯羨德在母亲坟前，虽然无法亲口说出忏悔，但小说暗示他已在教堂中领悟了宽恕的真谛。“没有人定你的罪”这句话，成为他精神上的归家。对于冯羨德而言，现实的家已经消失，但精神的家却可能通过宽恕重新建立。当物理的家不复存在时，精神的家是否可能？小说以开放式结尾邀请读者共同思考。巴特所说的“可写文本”正是这种需要读者参与生产的文本——《归家》的结尾不是一个闭合的答案，而是一个开放的问题。

结语：因果的必然与偶然

以罗兰·巴特的理论为核心，可以更为清晰地把握陈赞一《小丑》小说集的创作逻辑中的因果设计，在叙事形式上，他自觉运用对话作为“分布功能”安排因果链条，运用重复作为“整合功能”以强化命运的必然；在深层结构层面，他通过“零度写作”隐去作者情感介入，让故事本身呈现出人物命运的深层根源，并通过作品见的互文网络，使某一类型人物的个体命运上升为结构性的因果律——由于现代都市的急速变迁，在社会环境中的老人被牺牲、理想被挤压、人与人之间的爱被延误。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个人遭遇，而是社会结构对个体的“召唤”。

不过，陈赞一的深刻之处在于，他没有把人物完全束缚在因果必然性里，

²² 罗兰·巴特著. 罗兰·巴特随笔选[M]. 怀宇, 译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 第 307 页。

²³ 陈赞一《小丑》，香港：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3 年版，第 159 页。

经由“思考”这一叙事行为，他在设计因果链条间留下了自由的间隙，比如周愉临终时露出的笑容，何家安不愿交换的选择，廖青云坚持写作的决定以及华宏业达成的转型等，这些瞬间都是对因果逻辑的回应与超越，是在必然之中获取的短暂自由，焕发人性的光芒。这超越得以达成，依靠的是巴特所称的“读作者之死”，即当作者退出舞台之后，不再为物命运提纲唯一的解释，读者便被邀请进入文本，变成意义的共同创造者。陈赞一在极短的文章篇幅当中，因果的必然与自由的偶然相互交织，构成一个既闭合又开放的叙事世界，让因果本身成为读者叩问生命的通道。